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运动



7
61.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61.1
3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运动

安 知 编著

97
K261.1
3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运动

安 知 编著

目 录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及其原因	(1)
二、“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爆发	(7)
三、“六三”运动	(12)
四、爱国热潮席卷全国	(14)
五、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与拒签“和约”	(24)
六、改造社会的探索	(28)
七、走十月革命的路	(41)
八、“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45)

367902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及其原因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4月底到5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5月3日,北京内城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千余人的集会虽时近午夜才结束,但人们并没有去休息。座落在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灯火通明,青年学生们正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他们在一面面布的、纸的旗帜上,挥毫泼墨,苍劲有力地写上:“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第二天即5月4日,数千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勇敢地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当时,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所以,“五四”前夕,中国不少报纸,都在显赫的版面上写着:“外交大失败警耗!”“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众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准将山东省胶州

湾地方借与德国；准许德国在山东建造胶(州)济(南)铁道；铁道附近左右 30 华里的矿产，德人有开采权。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有 33 个国家卷入这次世界大战。战争双方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称为“同盟国”；英、法、俄称为“协约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都是在战争爆发后才陆续参加到“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参战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因此，1914 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两万余人在龙口登陆。9 月 26 日起，日军伸入山东内地；11 月 7 日，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

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还要独占全中国。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该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并要求取得各种新的特权。第二号，要求享有独霸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利。第三号，要求享有独霸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机关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事实上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很显然，这是一个旨在灭亡全中国，排斥第三国在中国扩

张势力,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为了避免引起第三国干涉,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曾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要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就不仅担心会遭到第三国(主要是英、美)的干涉,还担心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袁在谈判中迟疑不决,并一再要求日本让步。对此,日方极为不满。5月7日下午,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声言:“二十一条”第一、二、三、四各号,和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的条款,“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这时,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梦想早日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5月9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而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輿,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的卖国贼。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实行帝制,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和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统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1917年,黎元洪下台,大总统的职位由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接任,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握在段祺瑞手里。

段祺瑞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授意下,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宣布中国对德、奥处于战争状态。这

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先日本不同意中国参战。如果当时中国对德宣战,势必会影响到日本所取代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可是,到这时“二十一条”已经签定,1917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4国达成了秘密谅解的协议:4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个秘密谅解的协议,就成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一个借口。

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想趁机再从日本那里获得一笔借款,于是,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作了进一步的出卖。1917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照会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要以此作为借款的条件。章宗祥立即于同日复照,不仅逐条、逐句,一字不漏地把后藤的照会照抄下来,而且表示“欣然同意”。这份“欣然同意”的换文,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就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个借口。

1915年初,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中国留日学生2000余人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并通过了“全国一致,抵御外侮”的决议。2月底,留日学生代表回国。接着又有500余人回国。他们敦促政府从速采取对策,并同上海学界一起,开展爱国救亡运动。5月,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表示坚决反对,并向国内发出了《敬告全国父老书》的电文,向全国同胞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这些,对当时国内爱国运动的开

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7年,正当帝国主义激烈争战的时候,在“协约国”一方的俄国土地上,响起了十月革命的炮声,苏维埃政权诞生了。日本妄图借此机会,代替原来帝俄在中国北满地区的统治,并进而侵占俄国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为此,1918年2月5日,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俄国情势于联合国(即“协约国”——编者)日形不利”为借口,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商谈中日两国应在军事上共同行动问题。不久,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军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当地的中国地方官员,则要对日军的行动“尽力协助”。在日军进犯苏俄时,中国不仅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其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国留日学生在上述协定尚未签订时,就得知了协定的有关内容。1918年5月初,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对《协定》表示严重抗议,遭到了日本警察的侮辱、殴打,并被捕多人。为抗议日方的侮辱和暴行,学生们纷纷罢课回国,从5月到8月,回国者达2000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2/3。黄日葵、李达、李汉俊等,都是这时回国的。

5月21日,北大、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法专(北京法文专修馆)等校的学生2000余人,走出学校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要求取消反动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了8名代表,去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

尽管这次请愿运动没有结果。但是学生们感觉到有组织

起来的必要。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学生救国会还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但该杂志的实际内容，要比这个宗旨表现得更为激进。许德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中，对封建军阀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悲惨情景，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国侵略者，更表示了不屈的斗志，声言“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这种鲜明的爱国立场，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的政治倾向。因此，它一问世，就能比较积极地配合当时正在酝酿和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强了爱国学生之间的联系。但当时在社会上和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的刊物，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一问世，就高举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是自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死寂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它标志着一场新旧思想文化的战斗，已经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它采取4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1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

陈独秀常用“只眼”，李大钊常用“常”或“守常”等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刊物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传统。它是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于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一场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便首先在北京拉开了序幕。

二、“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爆发

经过长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和研究下午有关游行示威的具体办法。

中午过后，各校参加游行的队伍，就按照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高等师范和汇文大学的队伍到得最早，其他各校的游行队伍也陆续到达。在广场上，每到一批学生，先来者就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后到者则挥舞手

中的旗帜表示敬意。北京大学是这次示威游行的发起者，但他们的队伍到得最晚，因为当他们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突然遭到了北洋政府教育和警察总监派来的代表的无理阻拦。经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人据理力争，这两个代表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学生才冲破阻拦，经北池子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已是下午1时半了。

这天前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共有3000多名学生。他们人人手持小旗，上边书写着标语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自己鲜血书写的“还我青岛”4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使整个会场的气氛更为悲愤。

冲破了军警的拦阻，集会宣布开始。一名北大学生代表登上放在华表前的一张方桌，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同时，学生们还散发了一份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出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奔向东交民巷使馆区。但事与愿违，学生队伍在英、法等国使馆，不仅没见到公使，甚至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来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中国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这使得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于是决定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帐。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往北走，经富贵街、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关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前。这时已是下午4时半了。

这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刚由日归国的章宗祥，曹汝霖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传来了学生示威游行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宴会结束时，有人劝他俩暂避一时。他们无视学生的力量，认为武装的军警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于是在下午2时半毫不介意地回到赵家楼曹宅。

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警察守卫着，无法入内，于是便将手持的小旗抛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守卫的警察企图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但是愤怒的学生并不畏惧他们。这时有五位勇猛的学生跃墙跳入院内，从里边打开了曹宅的大门。在外等候的学生一拥

而入。学生冲入曹宅后，首先进入前面大厅。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名贵家具抛出室外，将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来摔在地上。之后，穿过花园，进入客厅。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正在这里。学生见到章宗祥，怒火万丈，将他痛打一顿。章躺倒装死，后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到同仁医院住院治伤。

学生到处寻找曹汝霖，始终未见到他的踪影。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异常气愤，为了惩戒卖国贼，有的学生在曹的内室放了一把火。顿时曹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眼看卖国贼的巢穴即将化为灰烬，学生们才开始散去。

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局监吴炳湘率领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脱者遂被反动派逮捕。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密谋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在对付学生的办法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见颇不一致。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主张严厉镇压爱国运动，严办被捕学生。而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

5月4日晚，在北洋政府密谋对策的同时，北京各校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蔡元培当晚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他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劝阻学生不要罢课。至于被捕学生，他保证竭力设法营救。愤激的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决定联络各校学生实行罢课。

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学生们在罢课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立免曹章诸贼之职,以正其卖国之罪。”罢课学生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并呼吁社会各界与学生“一致联合”,齐心协力地去“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学生罢课提出的要求,代表了全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共同呼声。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倒行逆施。

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虽不赞成学生罢课,但对学生的爱国热忱深表同情,并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5日下午3时,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会议推选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镛、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等为代表,负责与北洋政府交涉。代表们先到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推托责任。代表们又去教育部。因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辞呈,部中无人负责。无奈,他们再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总统府,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皆托辞不见,结果徒劳而返。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

北京学生的罢课,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使北洋政府感到

恐惧。北洋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被捕学生了。5月6日晚,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实现下列条件下,可以释放被捕学生。条件是:(一)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二)明日各校学生要全体上课。蔡元培当即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在蔡的劝说下,5月7日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同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6月28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烈火,在6月1日接连发布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公然为万夫所指的卖国贼辩解,替曹、章、陆洗刷卖国罪行,为的是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第二道命令再次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什么“纵火伤人”、“举动越轨”,“以爱国始,以祸国终”,甚至说学生已“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诉诸法律之制裁”,要求立刻停止罢课,“即日一律上课”。并公开宣布“切实查禁”学生们组织

的联合会、义勇队等。对“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要逮捕法办。

卖国者获得褒扬和保护，爱国者反遭诬陷和镇压，北京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使学生们气愤异常。更有甚者，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果然奉命行动，悍然逮捕了一批贩卖国货的学生。这就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互相勉励说：昔日田横尚且能带领 500 人同殉国难，在我国历史上放出异彩，难道我们今天 2 万多北京学生还不能效法前人的牺牲精神，把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吗！学生们蔑视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决定从 6 月 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活动。倘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

6 月 3 日上午，北京 20 余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学生的举动使反动派感到惊慌，他们急忙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达 178 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 月 4 日有 700 多名学生被捕，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的北大理科校舍扩充为临时监狱。

反动派的大逮捕，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女学生。6 月 4 日下午，北京 15 所学校的 1000 名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

正在此时，从上海传来了“三罢”的消息，北京政府慑于其威力和社会各界纷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民众呼声与压力，

不得不释放所有监禁的学生。这再次证明，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其结果和反动派的预料完全相反，不仅没有把学生的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全国人民，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特别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革命烈火燃遍了黄浦滩。

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从6月5日起开始实现了。当天，商、学、工、报各团体宣布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向全国发表通电：“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诸贼，主签亡国条约。北京学生为国请命，突被滥捕毒刑至400余人之多，高压毒手，显非空言所能挽回。此间工商界全体，于本日起一律辍业一日，誓无反顾，乞与应援，涕泣布闻。”“三罢”斗争坚持到6月12日，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3人的消息得到证实，上海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动员商界开市。历时7天的“三罢”斗争才宣告胜利结束。

四、爱国热潮席卷全国

(一)天津

天津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最大商埠，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近在咫尺。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这里。天津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立即响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5月5日，天津报纸刊登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和